

革命年代的自我保全

——評《周恩來的政治生涯》

• 阮思余



《周恩來的政治生涯》一書，為我們展示了較為完整的周恩來形象。梳理毛澤東與周恩來之間的複雜關係，對於理解周以及革命時代的自我保全問題至為關鍵。

巴努茵 (Barbara Barnouin)、余長更著，馬繼森譯：《周恩來的政治生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9)。

我們經常面臨着、也必須經常反思的問題就是，政治是甚麼？如何理解政治？如果仔細爬梳血雨腥風的中共歷史，我們不難發現，在革命年代，所謂最大的政治莫過於自我保全的問題。

要討論革命年代的自我保全問題，我們不妨從一些精英人物入手，尤其是毛澤東與周恩來。巴努茵 (Barbara Barnouin) 和余長更所著的《周恩來的政治生涯》(Zhou Enlai: A Political Life, 以下簡稱《生涯》，引用只註頁碼) 一書，為我們展示了較為完整的周恩來形象，以及與他相關的一些人物之間的複雜關係，這些人物包括毛澤東、林彪、江青、賀龍、陳毅等。誠然，在如此複雜的關係中，最重要的是毛周之間的關係。

一 革命年代：自我保全的需要

實際上，任何一個掌權者一旦上台後，總是面臨着一個難以處置的難題——就是如何處理作為最高當權者的自己與功臣之間的關係。如清代學者趙翼對朱元璋的點評就成為討論此一問題的必引論斷：「獨至明祖，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① 梳理毛周之間的這種複雜關係，對

於理解周以及革命時代的自我保全問題至為關鍵。我們可以從以下三方面來看：

第一，「毛澤東」和「周恩來」是人們把握二十世紀中國史的兩個關鍵詞。在1982年出版的《領導者》(Leaders)一書中，美國總統尼克松(Richard M. Nixon)如此點評二十世紀中國史：「半個世紀以來的中國史，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個人的歷史：一個是毛澤東，一個是周恩來，還有一個是蔣介石。」^②誠如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所言，「毛沒有周上不了台。」^③周的這種不可取代的作用，也為國民黨官員所認同。一位國民黨官員道出了類似的心聲：「如果當年在內戰期間有周恩來在我們這邊，那麼今天可能是毛澤東在台灣過着流亡生活，而我們可能在北京呢！」^④

第二，毛能破不能立，而周則擅長破立結合。革命與建設，是成功的革命者所面臨的雙重任務，這二者同樣不可偏廢。不僅革命失控會給國家與社會帶來嚴重災難，而且建設失敗也同樣會給國家與社會帶來巨大災難。這就是所謂的「破」與「立」的問題。毛周在這兩個方面的理解顯然有所差異。就此而言，尼克松的分析依然成立：「像大多數革命領袖一樣，毛能破，不能立。……沒有毛澤東，中國革命不會星火燎原。沒有周恩來，中國革命將如火如荼燒下去，直至化為灰燼。」^⑤用高文謙的話來說就是，「周恩來的治國理念和毛澤東有很大的不同。毛是以抓階級鬥爭立國，用政治運動統領一切。而周則比較務實，注重國際民生問題，主張以經濟建設為本。」^⑥周的主張，

在很大程度上也影響了鄧小平。這一點從周病重、鄧復出主持中央工作，搞全面整頓，以及鄧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力主改革開放，強調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完全可以得到明證。

第三，毛對周是軟硬兼施，既打又拉。毛周治國理念的差異，自然會影響到兩人之間的關係。自從1940年代延安整風運動以來，毫無疑問，在毛周之間處於主導和決定性地位的是毛。毛對周的態度是兩手並舉，既打又拉，軟硬兼施。周稍有出格，就需要敲一敲；周思想上如果有太大失落，又需要拉一拉。而且，毛還盡可能做到保持「敲」與「拉」之間的平衡。對毛來說，維持如此打拉平衡，「善莫大焉」：既可以直接馴化周，又可以間接教化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關於這一點，高文謙做了非常詳細的分析^⑦：

正是由於周恩來在黨內的份量、組織才幹以及凡是隱忍的態度，毛澤東後來改變了企圖將他完全排擠出軍隊的念頭，轉而採取了又打又拉的兩手策略：既把周視為可能向他在軍中的領導地位挑戰的對手而始終存有戒心，不斷敲打；又把他看作是成就革命大業所必須爭取乃至倚重的對象。終其一生，毛對周始終沒有擺脫這種矛盾心態的糾葛。這是我們透過錯綜複雜的歷史現象來把握毛本人如何處理毛、周關係的一把鑰匙。

縱觀毛周之間的複雜關係，我們可以從兩個方面來做些分析。從毛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我保全摻雜着競爭的需要、猜疑的需要，甚至

毛周之間處於主導和決定性地位的是毛。毛對周的態度是兩手並舉，既打又拉，軟硬兼施。對毛來說，維持打拉平衡，既可以直接馴化周，又可以間接教化黨內的高級領導幹部。

「保全自己」這四個字是理解周恩來政治生涯的關鍵詞，當然也是理解《生涯》一書的關鍵詞。不管是學界還是媒體，在談到周的時候，都會用上「保全自己」一詞。

是榮譽的需要，因此，毛要不斷革命——不僅要發動政治革命、經濟革命、社會革命，還要發動文化大革命。因為通過這些革命，他可以打倒各種各樣的「敵人」，雖然有些只是「假想敵」。

從周的角度來看，這種自我保全更多的只是一種不得不為之的選擇。周必須讓毛、讓黨內各種政治派別放心，他既沒有與毛競爭高位、爭一號人物的野心，更沒有搶奪毛的風頭、功高蓋主的欲念。周很清楚，他始終是三號人物，連二號人物都不是，也沒有任何對毛不忠、背叛毛的舉動。

不管是從誰的角度來看，自我保全在那個特定的時代是一種必須的、當然的選擇。這一點在周的身上表現得更是淋漓盡致。

二 自我保全：周恩來生存的藝術

在明晰了毛周這種複雜的政治關係之後，我們再來審視周，就不難發現，「保全自己」這四個字是理解其政治生涯的關鍵詞，當然也是理解《生涯》一書的關鍵詞。周去世之後，不管是學界，還是媒體，在談到周的時候，都會用上一個詞，這就是「保全自己」。國內有論者反對這種說法，理由是，周對毛的尊敬是發自內心^⑥。顯然，這種說法站不住腳。

周恩來去世後，美國的幾大報刊在相關報導中都特別強調周的自我保全藝術。1976年1月9日，亦即周逝世後的第二天，美國的《洛杉磯時報》(Los Angeles Times)如此評

價周：「從街上一個鼓動員，到國際舞台上一位政治家，周恩來是掌握政治上保存自己這門學問的大師，而在那個時間和空間，只要走錯一着，可以身敗名裂，甚至招來殺身之禍。」^⑦美國《新聞周刊》(Newsweek)如此寫道：「在中國，能生存下來，是一門藝術，而在20世紀，這門藝術大師，毫無疑問是周恩來。」^⑧1月19日，美國《時代》(Time)周刊也同樣強調這一點：「周恩來在長期革命生涯中磨練出來的保存自己的本能，到了文化革命時期對他很有用處。」^⑨就此而言，我們不妨仔細揣摩周的自我保全藝術。

(一) 漠然處置特工

中共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與周恩來等培養的特工為中共的勤力效勞密不可分。然而，一旦這些特工背叛中共，以及在中共建立了新政權之後，他們的命運就非常淒慘。由此，形成了周對待特工的兩種態度：對背叛者的極端報復與被整肅者的漠不關心。

第一，殘酷報復叛徒顧順章。周對待特工的殘酷，當以處死顧順章全家為典型。這是幾乎所有相關著作都會提到的周的殘酷一面的典型表現。1931年4月底，周的情報人員顧順章在武漢被國民黨逮捕。顧背叛中共後，導致國民黨新的一輪對中共的迫害。周對此採取了極端的報復行動。顧一人背叛中共的結果就是，全家遭殃。周派人一個晚上處死了顧家十五口人，而且將他們的屍首悄悄掩埋在上海的一個僻靜之處(頁34)^⑩。

第二，漠視被整肅的「漢奸」。中共革命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於潛入國民黨內部的特工及時、準確地傳回大量的有效情報信息。這些特工包括袁殊、潘漢年、關露、熊向暉、錢俊瑞、劉仲容、謝和庚等。應該說，他們為中共打敗國民黨、建立新中國，立下了汗馬功勞。建國之後，組織應該善待他們；周曾親自安插他們進入國民黨，由於他們身份特殊，周也應該保護他們。可是，周並沒有保護這些當年為他出生入死、隨時喪命的特工。不管周是出於甚麼樣的原因，未能向這些亟需救助的特工伸出援救之手，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經歷過整風運動以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周已經深知在政治上保全自己的重要性。對這些當年為他深入虎穴的「漢奸」的悲慘遭遇，周不聞不問、漠然處之，或許與他的過份自我保全不無關聯。《生涯》對此的分析非常精當：

但是，真實的周恩來不是完人。首先他是一個幸存者。在中國共產黨內半個多世紀連綿不斷的內部鬥爭中，活下來的人不但需要堅韌，而且要冷酷無情。處在總理的位置上26年，在中國歷史上最強大、最反復〔覆〕無常、疑心最重的皇帝的手下工作，需要機智、靈活，還要有這樣的能力：根據政治風向而不顧自己的信仰隨時調整自己立場的能力。（〈跋〉，頁252）

（二）積極參與造神

周恩來的自我保全，還反映在他積極參與造神。這裏所指的「造

神」，是中共黨內乃至全國，將毛澤東的英雄事迹變成了一個神話。毛澤東也成了神的象徵。周漠然處置特工與其積極參與造神，這二者之間既具有一致性，又具有不一致性。與漠然處置特工相同的是，為了保全自己，周隨時緊跟政治風向的能力堪稱一流。與漠然處置特工截然不同，周在中共的造神運動上積極參與、相機而動、靈活應變。在將毛推向神壇的過程中，周發揮了至為關鍵的作用。

第一，整風運動中向毛表忠誠最積極。周在黨內對毛的頌揚，最早、最經典的、也是被學界反覆引用的那段話，就是1943年7月周從重慶返回延安，在中央辦公廳為他舉行的招待會上的那段慷慨陳詞的演講。關於這一點，無論是《生涯》、高華的《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還是高文謙的《晚年周恩來》，都專門引用這段文字，而且特別予以解釋。儘管引用的出處不盡相同，個別表述有所不同，也絲毫不影響周這段話的生命力。時至今日，只要談到延安整風，只要談到周與毛，只要談到中共的造神運動，周的這段「經典」就不能不引用：

有了毛澤東同志的領導和指示，在這三年來許多緊急時機、許多重要關鍵上，保證了我們黨絲毫沒有迷失了方向，沒有走錯了道路。沒有比這三年來事變的發展再明白了。過去一切反對過、懷疑過毛澤東同志領導或其意見的人，現在徹頭徹尾地證明其為錯誤了。我們黨22年的歷史證明：毛澤東同志的意見，是貫串着整個黨的歷史時期，

經歷過整風運動以來的一系列政治運動，周已經深知在政治上保全自己的重要性。對當年為他深入虎穴的「漢奸」的悲慘遭遇，周不聞不問、漠然處之，或許與他的過份自我保全不無關聯。

在文革中，周以「緊跟毛主席」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最高準則。一方面，周可以對着造反派無所畏懼地說：因為我緊跟毛主席，諒你們打也打不倒。另一方面，周也必須在造反派面前表示他死心塌地緊跟毛主席，毫無二心。

發展成為一條馬列主義中國化、也就是中國共產主義的路線！毛澤東同志的方向就是中國共產黨的方向！毛澤東同志的政治路線就是中國的布爾什維克的路線（頁70-71）^③。

為甚麼這一稱頌被頻繁引用？高華列舉了各方面極力頌揚毛的人士：有黨的領導人物，諸如劉少奇、朱德、彭德懷、陳毅、羅榮桓；有毛的密友，諸如康生、陸定一；有原國際派代表人物，諸如王稼祥、博古、鄧發；有在延安的黨的元老，諸如徐特立、吳玉章。縱觀這些人頌揚毛的言辭，以周的發言最為驚世駭俗，也最為引人注目。就此而言，高華的點評非常到位：「周恩來的頌揚有着比其他人更重要的意義，作為黨的幾個歷史時期的主要領導人，周恩來對毛表示心悅誠服，對其他老幹部將有着重要的示範作用，如今周恩來都向毛澤東表示了忠誠，黨內還有誰不能低下他們高貴的頭呢？」^④或許毛要的就是這種效果，而周心領神會地做到了，基本上實現了毛的預期：在全黨統一思想、消除各種雜音；在全黨樹立毛澤東思想的偉大旗幟、塑造偉大領袖毛澤東的光輝形象。

第二，悉心導演的《東方紅》最艷麗。為給建國十五周年（1964）獻上大禮，周着人籌備了歌舞劇《東方紅》。這部歌舞劇在1940年代的民歌《東方紅》的基礎之上，加上一些舞蹈，以及謳歌中共和新中國的朗誦。在兩個多月的時間裏，周對這部劇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不僅過問主題、策劃、編導、場景這些

較為宏觀的問題，而且還關注燈光、化裝、排練等細枝末節。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將周視為這部劇的總導演一點也不為過。這部歌舞劇的主題就是要弘揚毛澤東作為中國革命的舵手、領袖與旗幟的光輝形象。因此，周特別強調兩點：一、將毛置於每一個舞台的中心，以凸顯毛領導中國革命和國家建設的關鍵角色與核心地位；二、將毛的三首詩詞（《井岡山》、《長征》、《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穿插在節目中，以凸顯毛的文韜武略與英雄氣概。從1964年10月2日上演以來，周親自抓的傑作《東方紅》終於「不辱使命」，獲得了巨大的成功：實現了從黨內觀看到市民觀賞、從歌舞劇到電影、從北京演出到全國播放的效果。最為重要的是，將毛的神化推向一個新的高潮。這是周對毛的神化的獨特貢獻（頁173-74）。

第三，緊跟毛主席到死的誓詞最寫意。在文革中，周以「緊跟毛主席」作為自己安身立命的最高準則。一方面，周可以對着造反派無所畏懼地說：因為我緊跟毛主席，諒你們打也打不倒。1967年8月23日凌晨，他對外事口造反派自豪地說：「我要是不緊跟毛主席，你們不打我也得倒；我緊跟毛主席，你們打也打不倒。」^⑤另一方面，周也必須在造反派面前表示他死心塌地緊跟毛主席，至死不渝，毫無二心。9月16日，周對中央文革的造反派說：「入黨四十六年來，我犯過不少錯誤，但是，我最終是跟着毛主席走的！要做到老，學到老，改到死，跟到死，一直跟到最後一刻。」^⑥實際上，在毛周的複雜關係

中，周一一直在為維護毛的聖明形象而努力不懈。就此而言，高文謙的點評可謂入木三分^⑧：

在以後長達三十多年的歲月裏，毛、周之間一直保持着這種政治合作的關係，直到周恩來生命的終結。周始終恪守自己的這種歷史角色，以君臣之道來處理與毛澤東的關係，盡忠守分，克盡厥職，從不作非分之想。無論是當他無端受到毛的猜忌和整治，還是在毛陷入狂想，將國家和民族引入災難之時，周總是隱忍退讓，委曲求全，從不出一句惡聲。即使在實際工作中糾正毛的錯誤時，也總是處處維護毛，唯恐有損「天皇聖明」的形象，乃至身後留下「逢君之惡」的罵名。

(三) 審慎保護老師

關於周恩來保護老師的問題，在更多的史料被披露以後，我們再也不能簡單地說，周在文革中保護了很多老師、老同志。因為在保護老師、老同志的問題上，周並不是意志堅決、勇於擔當的大管家。在保護別人的問題上，他的性格依然是「和稀泥」，隨風倒，沒有太多的原則，更不談信念。保誰？不保誰？為甚麼要保？如何保？在周的心中，這些都是大有藝術之舉。文革時期賀龍與陳毅截然不同的遭遇就清晰地說明了這一點。

第一，周並非真正要保護賀龍。高文謙對賀龍被整的遭遇做了相對較為詳細的闡述。這裏有幾個細節值得關注：

一、賀龍萬不得已才到西花廳（周的住處）避難，而不是周主動接

賀龍到他家避難。二、周關心賀龍的物質生活，而不關心他的政治生活。三、周成了賀龍的問訊者，而不是友善的保護者。迫於林彪的壓力，周與李富春一道審訊賀龍。審訊的意圖也很明確，主要是傳達林彪的意思：賀龍在林彪背後說他的壞話；在軍隊系統安插自己的親信；不僅不尊重林副主席，而且不尊重毛主席；不僅不請示不匯報，而且還不宣傳毛澤東思想；毛主席百年之後，賀龍必定不服從林彪。四、兩人之間只有質問者的權力，沒有被質問者的權利。讓賀龍極為悲傷的是，不管是賀龍在周家居住的十天，還是這次周對賀龍的談話，周由始至終不給賀龍申辯的機會。何況，按照政治局對高級幹部的批判規定，第一步還只是談話。當賀龍含淚追問周：「林彪可以這樣說，總理，你呢？」周卻無力地搖頭：「不說了，不說了。」（頁201）五、賀龍一去不復返，而沒有被周接回來。這次談話之後，賀龍從周家搬走，當時周的說法是：「給你找個地方，先去休息一下，等秋天我去接你回來。」^⑨可是，賀龍始終沒有等到周來接他。結果是林彪等人又給他加上「叛變投敵未遂」這一莫須有的罪名。讓賀龍失望的是，這一次周又沒有為他主持正義^⑩。

由此可見，周並沒有真正要保護賀龍的用心。當周從賀龍最初落難時的友善支持者變為後來的審問者，他的態度發生了一個根本性的轉變。這又主要取決於毛、林彪與江青等人的態度。他們中任何一個人的態度的變化都會導致周的態度的變化，雖然周試圖在他們的態度中尋求平衡，但實際上很難平衡。

周從賀龍最初落難時的友善支持者變為後來的審問者，其態度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又主要取決於毛、林彪與江青等人的態度。他們的態度變化都會導致周的態度變化，周試圖在他們的態度中尋求平衡，但實際上很難平衡。

周對權力的執掌與作用情況，洞若觀火。保誰，不保誰，雖然周心裏有桿秤，不過，還是要取決於與軍方、文革左派之間的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畢竟，所有的這些鬥爭，最後還得聽命於毛。

換言之，周基本上都是跟着他們態度的變化而變化。

第二，周保護陳毅是為了保護自己。在保護陳毅的問題上，如果與賀龍相比，周則上心多了，前後形成鮮明對比。可以說，為了保護陳毅，周竭盡全力，據理力爭。這裏同樣可以從一些細節上看出周的態度。

一、周坐鎮指揮批陳大會，確保陳毅檢查過關。為了讓陳毅免受侵害，周做了多方面的工作，針對造反派，周和他們說明陳毅的情況：陳毅是毛的人，心腸好，只是說話時有走火；批陳毅是搞錯了方向。針對陳毅本人，周一再修改陳毅的檢查稿，而且於1967年8月親自坐鎮主持國務院召開的批判陳毅的萬人大會，以確保陳毅順利過關。在周的種種努力與諸多關照之下，陳毅成為國務院被「解放」的第一位副總理。

二、周強調批判陳毅必須堅持可批不可倒。儘管陳毅一再「惹事」，諸如大鬧懷仁堂，給極力保護他的周帶來不少麻煩，但當造反派再次揪鬥陳毅以及試圖打倒陳毅的時候，周仍然堅持他保護陳毅的底線原則，這就是：可批不可倒。

三、周身體力行捍衛陳毅，堅決反對打倒陳毅。1967年8月6日，周恩來就外事口召開批判陳毅會議問題同造反派「約法三章」：批判會要以小會為主；會上不許喊「打倒」口號，掛「打倒」標語；不許有任何侮辱人格的舉動，如搞變相武鬥、揪人等^②。第二天（8月7日），當造反派打着「打倒三反份子陳毅」的大標語的時候，周堅持要造反派撤掉這個標語才願意進入外交部的批判

會現場，為此雙方僵持了一個小時。幾天後，當人民大會堂召開萬人批判大會，造反派再次掛出「打倒陳毅」的大標語時，周這次則帶着陳毅憤然退場。當造反派試圖再次揪鬥陳毅、揚言要攔截陳毅的汽車、組織群眾再次衝擊會場之時，因心臟病發作、被保健醫生攙扶着準備離開會場、走到門口的周不得不轉身怒斥造反派：「你們誰要攔截陳毅同志的汽車，我馬上挺身而出！你們誰要衝擊會場，我就站在人民大會堂門口，讓你們從我的身上踏過去！」^③周這種誓死捍衛陳毅的表態，也成為周保護老師的經典陳詞，被頻繁引用。

周為甚麼要極力保護陳毅？這是因為，周與陳毅在同一條船上，可謂同病相憐。如高文謙所言，「與其說這是周更偏護陳毅，不如說是他深知唇亡齒寒的道理。」用毛對周的話來說，這就是：「陳毅打倒了，你就差不多了。」^④面對造反派批判陳毅，周也不迴避這一點。1967年8月27日清晨，周接見外事口造反派。當造反派在批判陳毅的問題上一再糾纏時，周怒斥造反派：「你們完全是在向我施加壓力，是在整我了！」^⑤這一點也印證了尼克松的判斷，即周對權力的執掌與作用情況，洞若觀火^⑥。保誰，不保誰，雖然周心裏有桿秤，不過，還是要取決於與軍方、文革左派之間的現實政治鬥爭的需要。畢竟，所有的這些鬥爭，最後還得聽命於毛，以及毛的「最高指示」。周當然不能例外。如《生涯》所述，「政治生存顯然要求周忠實地、無條件地執行毛的隨心所欲的指示。」（〈跋〉，頁253）因此，周必須在保

誰、不保誰之間做出選擇。顯然，這完全是政治生存的需要。為了生存，他不得不這樣做。再如《生涯》所言：

雖然周有時也阻止過毛的某些激進的政策，可是他對毛的忠誠壓倒了他的其他一切考慮。他心甘情願地做這個專制君主的奴僕，在他的眼裏，這個專制君主代表的是中國共產黨和那麼多共產黨人為之犧牲了生命的事業。而且這個黨不會有錯。這種態度幫助他在政治上存活了下來。在最高領導中，他是唯一一個經歷了動亂而沒有被清洗的幸存者。就為這個，在自己最親近的同事們遭遇不公時，他情願裝做看不見；情願應付那些吵吵嚷嚷的紅衛兵和他們不合理的要求；情願面對黨內最高層的最無情的內訌，在這裏他不得不同毛扶植起來的一批傲慢的左派份子周旋，一步不慎就會導致他的滅頂之災。(頁175)

(四) 臨危憤然抗爭

如前所述，毛對周的兩手策略，即打拉結合的做法，一直延續到周的最後時日。因此，在時日無多的日子裏，周還要在醫院、在被推上手術台前繼續進行「保護晚節」的抗爭。只不過，這次保護晚節的舉動更加悲涼，更加堅定，也更加激動！

第一，堅決反對戴「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針對周在中美交往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毛決定就此批判周，而且還要由周自己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1973年11月21日至12月初，在一次批判會

上，周罕見地拍桌子，也罕見地頂撞了江青，還罕見地為自己辯護。依周的性格，他很少發脾氣、拍桌子；在江青打着毛的旗號肆虐橫行的日子裏，周很少頂撞江青，因為她知道來頭不小，背後有人。在被整、被做檢查的歷次政治運動中，周基本上都是迎合毛，主動做自我批評，檢討自己的種種錯誤，雖然有些可能是違心的自我批評。對此，高文謙寫道^⑤：

後來江青上網越來越高，指責周恩來「喪權辱國」、「蒙騙主席」、「給美國人下跪」，逼迫他承認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根本不由分說。周對這種在政治上對他的栽贓污辱，實在忍無可忍，當場對江青拍了桌子，說：我周恩來一輩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扣不到我的頭上！

對於周來說，跨出這一步實在不容易。因為，他首先要和自己做鬥爭，要和他曾經宣誓「誓死保衛」的人翻臉——畢竟，當林彪、江青聯手整楊成武時，周在批楊的「三·二四」大會上帶頭喊過「永遠忠於中央文革」、「誓死保衛江青」這樣的話^⑥。

1975年8月中下旬，當毛藉批《水滸》，進而批判周鄧抱團時，毛不僅要批上台後就力主全面整頓、企圖否定文革的鄧小平，還要批判鄧這個「急先鋒」的「幕後主帥」周恩來。對於毛的這一舉動，重病中的周反應異乎尋常。或許此時周的心情亦如高文謙所言，「周恩來對他已經病成這樣，毛澤東還不肯放過他，備感寒心，滿腹悲愴。」^⑦周的

針對周在中美交往中犯了「右傾投降主義」的錯誤，毛決定就此批判周，還要他主持批判自己的會議。在一次批判會上，周罕見地拍桌子，也罕見地頂撞了江青，還罕見地為自己辯護。

悲傷或許超越了簡單的重病，而是臨終前對毛的感慨：毛為何要這樣對他？為何到死還不放過他？就此而言，高文謙的分析或許道出了周的心聲²⁸：

他這時的傷心難過恐怕更甚於恐懼悲憤。因為他畢竟已經跟着毛澤東走了一輩子，在政治上亦步亦趨，守分盡忠，從無二心，可是直到臨死也沒有得到毛的諒解，相反還以欲加之罪不肯放過，這又怎能不讓周氏傷心之極呢？

第二，臨死奮力疾呼「我不是投降派」。關於周對被批為「投降派」的反映，有兩段話已經成為記錄周的抗爭的必引字句。其中一段是1975年9月周在醫院同身邊人員的談話：「一天，他在醫院同有關人員的談話中憤然提到：他們那些人（指「四人幫」）有些事做得太過份了！最近評《水滸》、批『投降派』，矛頭所指，是很清楚的。如果真有投降派，那當然應該批，可事實並不是這樣。我歷史上雖然犯過錯誤，但幾十年來還是努力為黨、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²⁹還有一段是同年9月20日下午2時，周在進入手術室前，在1972年6月周所作的關於「伍豪事件」的講話記錄稿上，用顫抖的右手鄭重簽上「周恩來」，並特地標明「於進入手術室（前）」的字樣，然後，周再也按捺不住了：「當擔架車進入手術室時，躺在車上的周恩來又突然睜開雙眼，拼盡全身力氣大聲說道：『我是忠於黨、忠於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³⁰

不管是堅決反對戴「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還是臨死奮力疾呼

「我不是投降派」，這都是周在堅持「保持晚節」的心態下力求自我保全的努力。或許在周看來，這是對他的聲名、對他的晚節的最大侮辱與傷害。因此，周不會接這頂帽子。雖然周之前在黨內鬥爭中被戴過不少帽子，「犯過很多錯誤」，可是，為了保持晚節，周還真是會憤憤然地為自己做最大努力的抗爭，儘管自己已經病入膏肓，來日不多。或許周還會這樣想：如果我現在不為保持晚節據理力爭、憤然抗爭，當自己百年之後，「右傾投降主義」一旦被蓋棺定論，之前所有的自我保全的戰果統統都將付諸東流。這也就是為甚麼我們要將周氏這最後的努力歸結為其自我保全的藝術的重要原因。

三 難以保全：周氏生存的瓶頸

如果前面主要討論的是周恩來在政治漩渦中的生存問題，那麼，對於周來說，最直接影響其政治生命的就是不斷惡化的健康狀況。這就給一貫游刃有餘地自我保全的周提出了嚴峻的挑戰。畢竟，周的治療必須得到毛的恩准。關於周被檢查出癌症卻得不到及時救治的情形，《生涯》有所披露。一是在1972年5月，醫生診斷周患有膀胱癌之後，沒有得到毛的支持，周的健康狀況每況愈下；二是在1973年1月，當周又開始尿血、醫生準備給周採用灼燒法治療時，卻被毛拖了兩個月，直到3月10日，才開始做膀胱鏡檢查與電灼治療；三是在1974年3月進行第二次電灼治療，

不管是堅決反對戴「右傾投降主義」的帽子，還是臨死奮力疾呼「我不是投降派」，這都是周在堅持「保持晚節」的心態下力求自我保全的努力。或許在周看來，這是對他的聲名、晚節的最大侮辱與傷害。

在效果不甚理想的情形之下，4月醫生建議做手術，一直得不到批准，直到周接待完5月28日至6月2日訪華的馬來西亞總理拉扎克 (Tun Abdul Razak) 後，6月1日才做手術 (頁237-42)。由此，我們需要反思的是，為甚麼周的膀胱癌一直得不到及時的救治？身為國務院總理、中國三號政治人物的周竟得不到及時救治，這又說明了甚麼問題？

首先，毛對周的生命具有直接的、也是最終的決定權。毛不僅可以決定周的政治生命，而且在周罹患膀胱癌的時候，毛對周的肉體依然具有最終的決策權：「因為按照中共黨內保健制度的規定，凡是政治局委員以上領導人的治病方案，必須經由毛澤東批准後才能實施。」^③因此，周的生命延續狀況就完全取決於毛的態度。然而，毛對周治病所持的消極態度，卻是周以及整個醫療組所不願意看到的。1972年5月以後，毛通過汪東興向周恩來醫療組的專家傳達了四條指示：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訴總理和鄧大姐；第二，不要檢查；第三，不要開刀；第四，要加強護理和營養^④。面對中央如此「保總理」，醫療組「十分不理解」，甚至要直接「向毛澤東陳情」^⑤，可是，他們卻不得不遵照執行這四條最高指示。這一點，至少說明了醫療組在給周治病時面對的難題，首先不是治療技術本身的問題，而是如何消除政治障礙的問題。

其次，毛一再拖延給周治病，也是政治的需要。如果說上述毛對周的治病具有最終的話事權，所說明的是保健制度層面與黨內實際決策權的歸屬問題的話，那麼，我們

需要進一步追問，為甚麼毛要一再拖延、導致周無法獲得及時救治？就此而言，或許我們只能往政治需要的角度去推理。林彪事件以後，毛周關係非常微妙。因為隨着黨內二號人物劉少奇、林彪的遠去，周一下子就與毛的關係拉近了很多，而這是毛非常警惕的。這從毛親自安排的兩個二號人物劉、林的離去，即可窺見一斑。於是，藉批林之際，毛又要借機批判周恩來，主要是批判他在歷史上的路線錯誤問題。更為重要的是，毛擔心自己百年之後，如果周還健在的話，會對自己一生的兩次得意之作，即打敗國民黨和發動文化大革命，尤其是後者，有所詆譏。這是毛最為憂慮的。從這一意義上來說，周病得真是時候，而且還是不治之症——至少毛是這麼看。顯然，如果救治不及時的話，周的病就不大可能治癒。這樣一來，毛就不需要對周再大做文章了。於是毛採取的手法就是，拖延給周治病。就此而言，高文謙的分析不無道理^⑥：

周本人眼下也已經得了癌症，不打自倒，因此不必在政治上再大動干戈了，只消在他治病的問題上做點文章就可以了。

在年初(1972)大病一場以後，急於安排後事的毛澤東非常擔心自己活不過周恩來，而一向在政治上態度曖昧的周如果在他身後帶頭翻文革案的話，以周在黨內外的聲望和手段，一呼百應，失去了庇護的黨內文革派根本不是對手。這就是毛隨後在周治病問題上的態度，讓人感到其中暗藏玄機的緣故。

周的身體是國家的，是黨的，在極端意義上也是毛的。因而，雖然貴為黨和國家幾代不倒的領導人，但周在治病這一點上，卻連最普通的人都不如。就自己最後的治病，周卻無法自保。

自我保全是毛時代的政治生存之道。周堪稱是革命年代善於自我保全的典範。在自我保全的問題上，周的內心信念就是所謂的「三不主義」：打不倒，趕不走，整不死。

周的身體是國家的，是黨的，在極端意義上，也是毛的。因而，雖然貴為黨和國家幾代不倒的領導人，但周在治病這一點上，卻連最普通的人都不如。就如高文謙所言，「令人可悲的是，周恩來在治病的問題上，卻無法像普通人一樣為自己作主，一切要聽由毛澤東的擺布。」^⑤歷史的詭異恰恰就是，在歷次政治運動中，在文革數個專案中，周掌握了那麼多人的命運，到頭來，卻連自己最自然的命運——身體健康狀況——都無法選擇，而要由支配了他後半輩子的人最後替他做主。雖然周善於自我保全被大書特書，可是就自己最後的治病，周卻無法自保。這不能不說是莫大的諷刺與歷史的悲哀！

四 結語

通過周恩來在毛時代的自我保全的分析，我們可以得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結論：

第一，自我保全是毛時代的政治生存之道。就個人來說，在革命年代，自我保全成為個人——哪怕是黨的高級領導幹部——介入政治生活的一個最基本的、也是最難以實現的政治準則。鄧小平關於周在文革中的作用有兩句很經典的概括，一句是：「如果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的局面可能更糟。」另一句是：「沒有總理，文化大革命也不會拖得那麼久。」^⑥前者的意思是，周對文革起了一定程度上的糾偏作用，包括保護了一些老同志；後者的意思是，周由於過份注重自我保

全，因而對毛和對文革派的牽制和制約作用相當有限。

第二，周堪稱是革命年代善於自我保全的典範。或許人們不一定能夠明白，為甚麼周會如此緊跟毛主席？為甚麼周會看準政治風向的變化而隨時變化？恐怕除了周的性格比較隨和之外，一個更為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懂得自我保全。易言之，在自我保全的問題上，周有其內心的信念。這也就是為甚麼周一一直被視為不倒翁的重要原因。周的這一內心信念，就是所謂的「三不主義」。在批林批孔運動之初，周曾經送給因被江青在大會上點名而欲辭職的中聯部部長耿飆三句話：「第一，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麼打，你自己不要倒；第二，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第三，人家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⑦概言之，所謂的「三不主義」，就是打不倒，趕不走，整不死。

第三，周無法逃脫毛時代自我保全的宿命。周因為善於自我保全而贏得了不少美譽。誠然，這是周的好運。然而，身處毛時代的周，身處極權主義時期的周，既無法逃脫政治對他的控制，也無法逃脫最高領袖、最高權威對他的控制。正因為有這種最高精神、最高指示存在，他才需要一次次去尋求毛的表態與支持，才需要一次次去學會自我保全，才需要在這種自我保全被破壞之後建立新的政治平衡以實現自我保全……循環往復，周不得不如此。然而，當周的膀胱癌不請自到之時，毛獲得了控制周的最好的一張牌。周的自我保全也受到了勝

朮癌的最大限度的挑戰。當周不得不住院，甚至無法決定自己身體的治療之時，周一貫擅長經營的政治平衡終於被打破，自我保全也就成為周最大的、也是最致命的問題。

綜上所述，革命年代的自我保全問題是研究革命政治的重要內容。這種自我保全，不僅僅是肉體生命的維繫，更重要的是政治生命的延續。不過，在垂暮之年，這種肉體生命比政治生命更為重要。因為這時候是肉體生命決定政治生命，而不是相反。要能夠做到自我保全，既需要妥善處理好與掌權者，尤其是最高掌權者的關係，又需要具備一定的自我保全藝術；既需要善於鬥爭，又需要在鬥爭中適時妥協。當一切權力歸於最高領導人的時候，這種鬥爭的最後結果也就取決於最高領導人的態度，這種態度會直接影響其麾下人物的政治生命與肉體生命。尤其是當這些人物的肉體生命出現危機的時候，其政治生命的維繫，也就依賴於領導人，特別是最高領導人的表態與指示。一旦這些態度與指示稍有怠慢，其政治生命也就岌岌可危。

註釋

① 趙翼著，王樹民校證：《廿二史札記校證》，下冊（北京：中華書局，1984），頁745。

②③④ 尼克松(Richard M. Nixon)：〈書香門第革命家〉，載方鉅成、姜桂儂編譯：《西方人看周恩來》（北京：中國和平出版社，1989），頁48；86；49。

⑤ 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打破政治局紀錄〉，載《西方人看周恩來》，頁150。

④ 引自阿查爾(Jules Archer)：〈巋然不動政治家〉，載《西方人看周恩來》，頁174。

⑥⑦⑧⑨⑩⑪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 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香港：明鏡出版社，2003），頁543；64；233；233；83；190；186-92；235；465；520；585；595；378；378；520；377；514；208；493。

⑳ 權延赤：《走下聖壇的周恩來》（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3），頁349。

㉑ 《洛杉磯時報》：〈周自己的長征〉，載《西方人看周恩來》，頁427。

㉒ 《新聞周刊》：〈幸存者之死〉，載《西方人看周恩來》，頁450。

㉓ 《時代》周刊：〈永訣〉，載《西方人看周恩來》，頁463。

㉔ 關於周恩來派人殺死顧順章家人的人數與掩埋地點，韓素音的說法是：顧順章全家十二口人中，除了一個十二歲的小孩外，全被處死，然後被埋在自家的院子裏。參見韓素音著，王弄笙等譯：《周恩來與他的世紀(1898-1998)》（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2），頁132。

㉕ 另參見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延安整風運動的來龍去脈》（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00），頁614；高文謙：《晚年周恩來》，頁76。

㉖ 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614。

㉗⑱㉙ 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編：《周恩來年譜(1949-1976)》，下卷（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7），頁176；183；183。

㉚㉛ 鐵驥：〈最後的鬥爭〉，載安建設編：《周恩來的最後歲月(1966-1976)》（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1995），頁352-53；353。

要能夠做到自我保全，既需要妥善處理好與掌權者，尤其是最高掌權者的關係，又需要具備一定的自我保全藝術；既需要善於鬥爭，又需要在鬥爭中適時妥協。